

* [基础心理学·人格心理]

主持人: 黄希庭

主持人语:情绪(或情感)包括情绪体验和情绪反应,前者属内心体验后者是行为表现;它赋予人们生活的力量和意义。从健全人格的观点来看,人最好是自由充分体验全部情感,因为它为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不懂得感情的人形同机器或僵尸。当然,个人体验到的情感应当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虚假的情感扭曲了与他人的关系,会损害健全人格,妨碍个人的成长。对于情感,健全人格者既不追求即时表现也不长期压抑;他们会在抑制与表现之间作出选择。当不危及其重要价值观时,他们会自由地体验情感:高高兴兴地笑,无拘无束地哭,或气势汹汹地发怒。而如果危及其重要的价值观时他们会克制自己的情感,并继续从事情感发生时正在进行的工作。看来,这种有选择释放和抑制情感是一种有涵养的表现。因为这有助

于个人的身体与行动能力免受情绪反应的损害,同时也不会因轻率的情绪反应而有损自己的工作、名誉及重要的价值观。如果持久地抑制情绪则将导致心身疾病,而不分青红皂白的情绪反应也是不健康的。情绪性人格维度反映的是个体在做事和人际交往中表现急躁和直爽的程度。“中国人的情绪性人格特点”一文依据本土化的中国人人格量表对中国人的情绪性人格维度及其两个次级因素的特点所作的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的性别、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均对情绪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大学生睡眠质量与A型行为模式的相关研究”一文用实地调查资料讨论了大学生的睡眠质量问题。“内隐自我与心理健康”一文从回顾文献的角度探讨了内隐自我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投射自我研究述评”是对近期以来有关的文献述评。

中国人的情绪性人格特点

王登峰¹, 崔红²

(1.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市 100871;2. 解放军总医院医学心理科,北京市 100853)

摘要:情绪性人格维度反映的是个体在做事和人际交往中表现急躁和直爽的程度。本研究依据本土化的中国人人格量表对中国人的情绪性人格维度及其两个次级因素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发现个体的性别、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均对情绪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上看,女性比男性的情绪性倾向更高,年龄越大,情绪性程度越低,工人农民与行政管理者和教科文卫人员相比情绪性更明显,而婚姻状况也与年龄和性别一起影响个体的情绪性倾向,而急躁(耐性)和爽直特点的“双高者”和“双低者”也有明显的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差异。

关键词:情绪性;耐性;爽直;中国人人格;性别;年龄;职业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6-0001-06

一、引言

根据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1]以及对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系统收集和评定^[2-4],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被确定为由七个大的维度构成^[5-7],并已经编制了测量这七个维度的综合性人格量表(QZPS)^[8-11]和形容词评定量表(QZ-PAS)^[12]。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个维度包括外向性、善良、行事风格、才干、情绪性、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而西方的人格结构由外向性、愉悦性、公正严谨性、神经质和开放性等

五个维度构成^[13-14]。中国人人格的七因素模型不仅与西方的“大五”人格模型存在差异,也与中文人格量表(CPAI)测量的人格维度^[15-16]存在明显的差异。虽然在西方的人格结构中没有“情绪性”维度,但却蕴涵了情绪性维度的内容。根据中国被试对西方大五人格量表^[14]项目的反应所做的因素分析表明,西方人格量表的项目重新组合成为七个因素的结构,与中国人人格结构的七因素模型非常接近^[17-18]。研究者对中西方这种人格结构内容的“重构”已经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提出了解释^[19-21]。

* 收稿日期:2008-09-20

作者简介:王登峰(1965-),男,山东安丘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人人格量表的编制与试用”(30270469),项目负责人:王登峰。

西方人格量表中心神经质维度的内容均属于消极情绪的组合,如 NEO PI-R 的神经质维度共包括 6 个小因素,即焦虑、愤怒/敌意、抑郁 (Depression)、自我意识、冲动 (Compulsive)、脆弱,它们都反映的是被试的消极情绪体验和表现的程度^[15]。对 NEO PI-R 的神经质维度与 QZPS 的联合因素分析表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不存在单独的神经质维度,但其内容却分别与中国人人格结构中的外向性、善良、才干和人际关系等维度密切相关^[22]。同时,研究表明,CPAI 中的 EMO 不仅主要与 QZPS 的 QX1(耐性)相关显著,而且与 XF1(严谨)和 WX3(乐观)等小因素也有较高的相关,即 EMO 主要反映的是个体(对挫折)的耐受能力差、悲观以及过分严谨的特点^[16]。而情绪性(QX)则是中国人人格结构中比较独特的维度,不仅与西方大五人格结构中的每一个维度,包括神经质维度相关很低^[18],与 CPAI 中的所有分量表,包括 EMO(情绪性)分量表的相关也比较低^[16]。

情绪性(QX)由耐性和爽直等两个相互独立的次级因素构成。耐性(QX1)反映的是个体在人际交往和做事过程中的理智、平和及控制情绪的能力。高分者在与人交往时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脾气温和,在处理问题时稳重、平和;低分者与人交往时比较急躁、冲动、甚至喜怒无常,在处理问题时草率、冒失。爽直(QX2)反映的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直爽和不加掩饰的特点。高分者表现为心直口快、直截了当和不加掩饰;低分者则喜欢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情绪性总分反映的是个体在做事和处理人际关系时的情绪稳定性特点,与单纯的消极情绪有明显的区别。高分者急躁、冲动,对情绪不加掩饰和难以控制;低分者情绪稳定、平和,情绪表达委婉和可控。而且情绪性的两个次级因素分别反映的是个体的“急躁”和“直爽”的特点。这两者之间虽然有联系,但却是不同的人格特点,做事或情绪急躁的人不一定直爽,而直爽的人也不一定急躁。

情绪性人格维度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对大学生人格与主观幸福感(SWB)的相关研究发现情绪性与 SWB 的各因素(包括掌控因素、活力因素、被接纳因素以及放松因素)都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只与掌控因素(对自己的行为、情感、思维、记忆和情绪的控制能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24$)^[23]。

情绪性与身心健康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情绪性人格维度中的“耐性”与 SCL-90 的愤怒/敌意因子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 -0.11$ ^[24]。情绪性中的“耐性”次级因素与行为抑制^[25]中的对自信、独立和支配的抑制存在显著相关,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14 、 0.16 和 0.13 ;而“爽直”次级因素与行为抑制总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beta = 0.07$)^[26]。情绪性中的“爽直”次级因素与自我和谐^[27]中的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刻板性及自我灵活性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16 、 0.32 和 0.12 ,即性情直爽的人一方面会体验到更高的自我与经

验间的不和谐、自我的刻板性,但同时也会有更高的自我灵活性^[28]。

另外,精神分裂症、药物依赖和罪犯等特殊群体的情绪性人格维度特点也预示了中国人情绪性人格维度的效度。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病人(恢复期)的情绪性分数及耐性和爽直分数与对照组没有显著的差异^[9];药物依赖者的情绪性分数显著高于对照组,耐性分数显著低于对照组,而爽直分数显著高于对照组^{[9][29]};劳教人员中暴力犯罪(抢劫、杀人等)与非暴力犯罪(盗窃、欺诈等)者的情绪性分数没有差异,但与对照组相比情绪性分数和爽直分数显著较高,而耐性分数显著较低^[9]。

由于情绪性人格维度属于中国人独特的人格倾向,因此有必要系统分析情绪性特点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群体中的分布情况,以期更加深入地把握情绪性人格维度的内涵与特点。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比较不同群体的情绪性维度特点。另外,由于情绪性的两个次级因素(耐性与爽直)分别反映的是个体做事和人际交往中的“急”和“直”的特点,本研究还将比较在耐性和爽直分数上均高(既急又直)及均低(既不急又不直)的个体的年龄、性别和职业方面的分布差异。

二、方 法

(一)被试

2 077 名被试。男性 1 074 人,其中工人农民 462 人,行政管理 371 人,教科文卫 221 人,有配偶 572 人,无配偶 582 人;女性 1 003 人,其中工人农民 374 人,行政管理 353 人,教科文卫 225 人,有配偶 442 人,无配偶 510 人。年龄分布为 16—62 岁,平均年龄 34.76 ± 10.11 岁。其中青年组(16—25 岁)389 人,中青年组(26—35 岁)759 人,壮年组(36—45 岁)432 人,中年组(46—62 岁)492 人。被试中有 14 人未注明职业,57 人未注明婚姻状况。被试来自全国 39 个省区,均为单独参与研究,且均有报酬。

(二)研究工具

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8-11]。由 180 个项目构成,测量人格的七个维度及其 18 个二级因素。被试对每一个项目都做 1(非常不符合)到 5(非常符合)的评定。本报告只分析情绪性维度的结果。

三、结 果

(一)情绪性人格维度的分数分布特点

各组被试在情绪性维度及其两个次级因素(耐性、爽直)上的平均分数和标准差见表 1。以情绪性为自变量,性别、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主效应中只有职业($F = 17.47, p < 0.001$)和性别($F = 5.59, p < 0.05$)显著。成对比较的结果表明,工人农民组和教科文卫组的分数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行政管理组;女性分数显著高于男性;青年组的分数显著高于壮年组和中年组;其他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

表1 不同性别、职业、年龄和婚姻状况被试的情绪性维度平均数和标准差(M±SD)

| 性别 | 被试情况 | | | N | 情绪性 | 耐性 | 爽直 |
|----|------|------|-----|-----|-------------|-------------|------------|
| | 年龄组 | 职业 | 婚姻 | | M±SD | M±SD | M±SD |
| 男 | 青年 | 工人农民 | 有配偶 | 28 | 72.21±12.13 | 44.29±10.28 | 26.50±3.87 |
| | | | 无配偶 | 49 | 66.78±14.87 | 49.24±10.86 | 26.02±5.98 |
| | | 行政管理 | 有配偶 | 25 | 58.84±10.02 | 54.24±7.12 | 23.08±4.48 |
| | | | 无配偶 | 30 | 63.63±13.23 | 51.67±9.49 | 25.30±6.31 |
| | | 科教文卫 | 有配偶 | 15 | 68.13±11.15 | 46.80±7.27 | 24.93±5.04 |
| | | | 无配偶 | 27 | 66.63±15.73 | 49.48±12.03 | 26.11±5.92 |
| | 中青年 | 工人农民 | 有配偶 | 96 | 67.05±12.85 | 48.68±9.58 | 25.73±5.22 |
| | | | 无配偶 | 101 | 66.73±13.44 | 49.14±9.81 | 25.87±6.06 |
| | | 行政管理 | 有配偶 | 52 | 61.23±12.65 | 52.85±9.39 | 24.08±4.84 |
| | | | 无配偶 | 69 | 64.51±13.44 | 50.93±9.62 | 25.43±5.69 |
| | | 科教文卫 | 有配偶 | 32 | 64.66±14.48 | 50.47±10.00 | 25.13±5.90 |
| | | | 无配偶 | 48 | 67.00±14.36 | 49.63±11.31 | 26.63±4.93 |
| | 壮年 | 工人农民 | 有配偶 | 38 | 67.92±9.13 | 49.24±6.80 | 27.16±4.86 |
| | | | 无配偶 | 38 | 64.39±9.87 | 51.50±6.73 | 25.89±5.19 |
| | | 行政管理 | 有配偶 | 33 | 62.00±12.42 | 52.85±8.74 | 24.85±5.50 |
| | | | 无配偶 | 51 | 65.20±12.00 | 51.49±8.72 | 26.69±5.67 |
| | | 科教文卫 | 有配偶 | 18 | 71.61±8.15 | 45.94±7.09 | 27.56±2.06 |
| | | | 无配偶 | 30 | 61.57±10.66 | 52.67±8.90 | 24.23±4.42 |
| | 中年 | 工人农民 | 有配偶 | 64 | 64.92±13.51 | 51.05±10.40 | 25.97±5.05 |
| | | | 无配偶 | 48 | 66.27±11.36 | 51.15±9.70 | 27.42±4.78 |
| | | 行政管理 | 有配偶 | 48 | 64.19±14.22 | 52.19±10.99 | 26.38±6.05 |
| | | | 无配偶 | 63 | 64.90±12.59 | 52.73±9.61 | 27.63±4.71 |
| | | 科教文卫 | 有配偶 | 23 | 62.91±14.94 | 53.09±11.27 | 26.00±5.95 |
| | | | 无配偶 | 28 | 66.14±12.15 | 51.36±8.17 | 27.50±6.57 |
| 女 | 青年 | 工人农民 | 有配偶 | 28 | 72.61±14.53 | 43.89±10.35 | 26.47±5.00 |
| | | | 无配偶 | 49 | 71.74±13.23 | 45.95±9.54 | 27.69±5.65 |
| | | 行政管理 | 有配偶 | 25 | 64.79±7.00 | 51.00±5.88 | 25.79±4.09 |
| | | | 无配偶 | 30 | 66.90±11.03 | 49.24±7.60 | 26.14±5.72 |
| | | 科教文卫 | 有配偶 | 15 | 71.26±15.82 | 45.56±10.21 | 26.81±6.73 |
| | | | 无配偶 | 27 | 65.32±11.54 | 50.76±9.54 | 26.08±5.07 |
| | 中青年 | 工人农民 | 有配偶 | 96 | 70.62±14.90 | 46.33±10.91 | 26.94±5.66 |
| | | | 无配偶 | 101 | 68.78±13.56 | 48.44±10.32 | 27.30±5.33 |
| | | 行政管理 | 有配偶 | 52 | 64.36±12.10 | 51.26±8.39 | 25.62±5.39 |
| | | | 无配偶 | 69 | 64.13±14.10 | 51.48±9.94 | 25.61±5.80 |
| | | 科教文卫 | 有配偶 | 32 | 68.54±14.88 | 48.39±10.03 | 26.93±6.19 |
| | | | 无配偶 | 48 | 66.60±10.38 | 49.36±8.15 | 25.96±5.20 |
| | 壮年 | 工人农民 | 有配偶 | 38 | 67.52±10.48 | 51.11±7.35 | 28.63±4.98 |
| | | | 无配偶 | 38 | 70.50±14.75 | 48.10±11.35 | 28.60±5.74 |
| | | 行政管理 | 有配偶 | 33 | 60.65±11.00 | 54.37±7.64 | 25.02±5.81 |
| | | | 无配偶 | 51 | 64.22±13.17 | 52.71±9.89 | 26.93±5.57 |
| | | 科教文卫 | 有配偶 | 18 | 63.44±13.23 | 51.72±9.77 | 25.17±5.36 |
| | | | 无配偶 | 30 | 68.33±10.31 | 49.80±7.43 | 28.13±5.48 |
| | 中年 | 工人农民 | 有配偶 | 64 | 68.51±12.27 | 49.41±9.52 | 27.92±4.95 |
| | | | 无配偶 | 48 | 63.43±13.88 | 52.74±10.86 | 26.17±6.16 |
| | | 行政管理 | 有配偶 | 48 | 68.08±12.17 | 49.88±9.13 | 27.96±5.31 |
| | | | 无配偶 | 63 | 65.19±13.96 | 52.35±10.47 | 27.53±5.89 |
| | | 科教文卫 | 有配偶 | 23 | 65.25±13.08 | 52.50±10.55 | 27.75±4.70 |
| | | | 无配偶 | 28 | 65.09±15.37 | 52.96±12.28 | 28.04±5.37 |

在情绪性分数上,性别、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年龄与职业的交互作用显著($F=2.20, p<0.05$),尽管总体上看情绪性分数一直是工人农民、教科文卫和行政管理组的分数递减,但三组被试之间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小,在46—62岁(中年组)时三种职业的分数趋于一致。婚姻状况与职业的交互作用显著($F=3.19, p<0.05$),三种职业的差异在有配偶者中显著大于无配偶者。最后,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的交互作用显著($F=4.28, p<0.01$),总体上女性的情绪性分数高于男性,但有配偶者在36—45岁(壮年组)时男性分数高于女性,无配偶者则在46—62岁(中年组)时男性分数高于女性。

以耐性为自变量,性别、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主效应中只有年龄($F=8.04, p<0.001$)和职业($F=18.26, p<0.001$)显著。成对比较的结果表明,工人农民组的分数显著低于行政管理和教科文卫组,教科文卫组的分数显著低于行政管理组;青年组和青壮年组的分数显著低于壮年组和中年组;其他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只有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的交互作用($F=3.02, p<0.05$)显著,其趋势与情绪性分数相反,即总体上男性的耐性分数高于女性,但有配偶者在36—45岁(壮年组)时女性分数高于男性,无配偶者则在46—62岁(中年组)时女性分数高于男性。

以爽直为自变量,性别、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主效应中性别($F=12.70, p<0.001$)、年龄($F=5.37, p<0.001$)和职业($F=5.74, p<0.01$)显著。成对比较的结果表明,工人农民组的分数显著高于行政管理组;青年组和青壮年组的分数显著低于中年组;男性分数显著低于女性;其他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只有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的交互作用($F=3.02, p<0.05$)显著,其趋势与情绪性分数完全一致。

(二)耐性与爽直分数的组合特点

按照耐性与爽直的分数分布,将分数最高和最低的27%的被试定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其中耐性和爽直分数均为低分组(“双低被试”)的被试共60名(占全体被试的2.89%),耐性和爽直分数均为高分组(“双高被试”)的被试共65名(占全体被试的3.13%)。

“双低被试”中男女分别为31和29人,差异不显著, $\chi^2=0.07, p>0.05$;青年组、青壮年组、壮年组和中年组被试分别为12、23、8和16人,差异显著, $\chi^2=7.87, p<0.05$;工人农民、行政管理和教科文卫人员分别为29、14和17人,差异显著, $\chi^2=6.75, p<0.05$;有配偶者和无配偶者分别为34和26人,差异不显著, $\chi^2=1.37, p>0.05$ 。这一结果表明,在做事和人际交往中表现为既不急躁又不爽直的个体中,按年龄划分时以中青年组最多,壮年组最少;按职业划分时以工人农民最多,行政管理人员最少;性别和婚姻状况

差异则不显著。

“双高被试”中男女分别为33和32人,差异不显著, $\chi^2=0.15, p>0.05$;青年组、青壮年组、壮年组和中年组被试分别为2、12、16和30人,差异显著, $\chi^2=18.02, p<0.001$;工人农民、行政管理和教科文卫人员分别为26、25和14人,差异不显著, $\chi^2=4.09, p>0.05$;有配偶者和无配偶者分别为18和47人,差异显著, $\chi^2=14.06, p<0.001$ 。这一结果表明,在做事和人际交往中表现为既急躁又爽直的个体中,按年龄划分时以中年组最多,青年组最少;按婚姻状况划分时以无配偶者最多;性别和职业差异则不显著。

四、讨论

情绪性人格维度反映的是个体在做事和人际交往中表现急躁和直爽的程度。本研究依据本土化的中国人人格量表,在大样本施测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人的情绪性人格维度及其两个次级因素的特点,发现个体的性别、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均对情绪性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上看,女性比男性的情绪性倾向更高,年龄越大,情绪性程度越低,工人农民与行政管理者和教科文卫人员相比情绪性更明显,而婚姻状况也与年龄和性别一起影响个体的情绪性倾向,而急躁(耐性)和爽直特点的“双高者”和“双低者”也有明显的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差异。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急躁”和“爽直”的态度

本研究的结果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待“急躁”和“爽直”的特点。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不鼓励个体表现“急躁”和“爽直”,而且要求个体表现出与急躁和爽直相反的“平和”与“含蓄”。《论语》中有多处提到为人、为政的根本就是谨言慎行,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识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30]。耐人回味的是,中文里“文化”本含有“文饰化裁”之意。在古文字中,文通纹,化通变化,或花、华,即“在表面进行整饰以使其发生变化”之意^{[20][31]}。在信奉“人性本善”的中国文化中,文化的作用就是对行为的“矫饰”,以“遮掩”行为的真实面目,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更接近人性,即“善”或“完美”。而“文饰”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言行与人性(善)更接近,因此实际的言行之上都已经增加了一层“文饰”,变得面目不清了。即使言行中并未表现出“恶”,也会在自己的言行之上增加文饰以彰显人性的“光芒”。例如,无论面对成功或失败的情境,中国人都倾向于为自己辩解,只是辩解的目的有所不同:失败时辩解的目标是使自己的行为“看上去没那么糟”,而成功时辩解的形式是自己的行为“没那么好”,但目标是为了使自己“不表现”骄傲,以及一旦表现不好,也可以更方便进行辩解^[32]。

中国文化的“文饰化裁”特点会影响到个体对自己言行的控制以及对他人言行的认识。首先,中国人在表现出自

己的愿望和要求之前虽然要对“其个人效果”进行评估,但更需要对自己言行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估。在很多情况下,尽管自己非常希望表达某种意愿或做出某种行为以达成自己的内心需要,但由于直接表达可能会有违社会规范或他人的期望,或可能造成他人的消极看法而只好作罢或以“转换”、“曲折”、“间接”的方式表达。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直接表达的意见或行为并非内心真实想法的确切含义,而很可能是经过“文饰化裁”以后的表达。因此,中国人很少会不加限制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或意见,即使是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也会因为担心被人认为是骄傲而不去表达。当自己拿不准是否正确时则更难表达。在中国文化中,直接、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要求和看法往往被看作是幼稚和不成成熟的表现^[20]。在本研究中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被试的耐受性分数递增,而爽直分数递减,而且女性比男性更急躁,充分说明了社会文化环境对行为的“模塑”作用。

另外,如果个体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不同,行为的掩饰性也应有所不同。在一般情况下,工人农民的言行基本上属于“个人行为”,社会角色的要求并不高,因而对自己言行的掩饰可能比较少;行政管理人员和知识分子的言行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行为”,对他们的社会角色的要求也比较高,因而可能更需要掩饰自己,而且由于行政管理人员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可能会比知识分子容易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掩饰。本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本研究中,工人农民的“急躁”(耐性的另一极)和“爽直”分数都比教科文卫和行政管理人员高,而且教科文卫人员的“急躁”分数比行政管理人员高。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总体上女性比男性更“急躁”、更“爽直”,但有配偶者中在36—45岁(壮年组)时男性比女性更急躁和爽直,无配偶者则在46—62岁(中年组)时男性比女性更急躁和爽直。这表明婚姻状况也会影响个体的情绪性特点,而且有配偶者比无配偶者出现性别差异反转的时间提前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既急又直”与“不急不直”的特点

在本研究中随着被试年龄的增加,其急躁和爽直分数均逐渐下降,这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对个体言行的塑造作用的积累效应。文化的这种塑造作用可能会通过两种方式起作用,一种是通过被动适应的过程,即如果个体表现急躁和直爽时都受到惩罚,那么他们以后再次表现急躁和直爽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从这个意义上看,最适应中国文化的个体应该是“不急不直”的,而“既急又直”的个体则不适应中国文化。

除了被动适应以外,个体还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言行去主动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要求。这时文化因素只是影响个体言行的一个因素,个体可以根据对情境的判断决定自

己的行为风格。如果个体认识到即使表现急躁和爽直也不会受到惩罚,或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或表现急躁和爽直甚至还会有利于对环境的适应,这时个体的行为就会与一般性的文化要求(即不急不直)不一致。

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上支持了这一分析。在“又急又直”的群体中,性别和职业的差异并不显著,并没有出现行政管理明显少于其他职业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行政管理人员可以对情境有较大的控制能力,可以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表现急躁和爽直有关。而“又急又直”者中中年人最多,可能与中年人往往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最大的控制能力(与本研究中的其他年龄组相比),而且也相对较少顾忌他人的评价有关。

相比之下,“不急不直”者除了是文化环境塑造的结果以外,可能也与他们对环境的控制能力比较低有关。在本研究中“不急不直”者以工人农民最多,行政管理人员最少,恰好反映了他们在对环境控制能力方面的差异。而年龄差别中,中青年(26—35岁)被试最多,壮年组(46—62岁)最少也可以归结为对环境控制能力方面的差异。

参考文献:

- [1] John O P, Angleitner A, Ostendorf F. The lexical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rait taxonomic research [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88, 2, 171-203.
- [2] 陈仲庚,王登峰. 670个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好恶度、意义度、熟悉度的研究[R].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研究资料,1984.
- [3] 杨国枢,李本华. 557个中文人格特质描述性形容词的好恶度、意义度、熟悉度的研究[R]. 台湾大学心理系研究报告, 1971.
- [4] 王登峰,方林,左衍涛. 中国人人格的词汇研究[J]. *心理学报*,1995,27(4):400-406.
- [5] 崔红. 中国人人格的词汇学研究及形容词评定量表的建立[D].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 [6] 崔红,王登峰. 中国人人格结构的确认与形容词评定结果[J]. *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1(2):89-95.
- [7] 杨国枢,王登峰. 中国人的人格维度[C]. 北京:第三届华人心理学大会论文,1999.
- [8] 王登峰,崔红. 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的编制过程与初步结果[J]. *心理学报*,2003,35(1):127-136.
- [9] 王登峰,崔红. 中国人人格量表的信度与效度[J]. *心理学报*,2004,36(3):347-358.
- [10] 王登峰,崔红. 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与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与QZPS-SF)的常模[J]. *心理学探新*,2004,24(4):43-51.
- [11] 王登峰,崔红. 中国人人格七因素量表(QZPS-SF)的信度与效度[J]. *心理科学*,2005,28(4):944-945.
- [12] 崔红,王登峰. 中国人人格形容词评定量表的信度和效度[J]. *心理科学*,2004,27(1):185-188.
- [13] John O P. The “big five” factor taxonomy: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in the natural language and in questionnaire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M], ed. By L. Pervin, Guilford Press, 1990.
- [14] Costa P T, McCrae R R.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

- ry (NEO PI-R) and NEO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 [M].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Inc., Lutz, FL; 1989.
- [15] Cheung F, Leung K, Zhang J X, Sun H F, Gan Y Q, Song W Z, Xie D. Indigenous Chinese personality constructs: Is the five-factor model complete[J]?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Psychology*, 2001, 32, 407-433.
- [16] 王登峰,崔红. 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的探索[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5,31(5):5-16.
- [17] 王登峰,崔红. 中西方人格结构的理论和实证比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3,40(5):109-120.
- [18] Wang D, Cui H, Zhou F. Measuring the personality of Chinese: QZPS versus NEO PI-R[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 (1): 97-122.
- [19] 王登峰,崔红. 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文化意义[C]. 台湾中央研究院主办,台北:第七届华人心理与行为科际学术研讨会大会报告,2004-1024-26.
- [20] 王登峰,崔红. 心理社会行为的中西方差异:“性善一性恶文化”假设[J]. *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4(1):1-7.
- [21] 王登峰,崔红. 中西方人格结构差异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以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和西方五因素人格量表(NEOPI-R)为例[J]. *心理学报*,2008,40(3):327-338.
- [22] 王登峰,崔红. 中国人有没有独立的“神经质”人格维度[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5,31(3):25-30.
- [23] 田林. 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研究[D].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心理学系,2004.
- [24] 崔红,王登峰. 一般人群中人格维度与心身症状的相关研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3):298-300.
- [25] 王登峰,崔红. 行为抑制量表的信度与效度[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13(1):1-3.
- [26] 王登峰,崔红. 人格维度与行为抑制的相关研究[J]. *心理科学*,2006,29(1):7-8.
- [27] 王登峰. 自我和谐量表的编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4,2(1):19-22.
- [28] 崔红,王登峰. 人格维度与自我和谐的相关研究[J]. *中国心理卫生*,2005,19(6):370-272.
- [29] 王登峰,崔红. 吸毒者的人格特点分析[J].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3,12(3):215-218.
- [30] 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整理本)(23).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31] 黎鸣.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21世纪中国人应当怎样变得聪明起来[M].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
- [32] 王登峰. 责备与辩解的心理控制源影响:进一步的证据[J]. *心理学报*,1992,24(2):314-321.

责任编辑 曹莉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ersonality: Emotionality

WANG Deng-feng¹, CUI Hong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 PLA General Hospital, Beijing 100853,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ity, one of th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indicates the degree of impetuosity and straightness in work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Chinese personality scale (QZPS), the current research explored in Chinese subj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ity and its two secondary factors, patient (opposition of impetuosity) and straightnes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emotionality was influenced at different levels by sex, age, and occupations, and generally males are less impetuous and candid than females. And the older the age is, the less emotional the subjects are. Workers and farmers have higher emotionality than personnels in administration, education, culture and sanitary career did. The marital status, together with age and sex, also has influence on emotionality. Subjects who have both high degree in impetuosity and straightness, or vice versa hav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aspects of age, occupations and marital status.

Key words: emotionality; patience; straightness; Chinese personality; sex; age; occupation